

历史人类学典籍研究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

〔清〕严如煜 著 罗康隆 张振兴 编著 杨庭硕 审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历史人类学典籍研究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

〔清〕严如煜 著 罗康隆 张振兴 编著 杨庭硕 审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 / 罗康隆、张振兴编著, 杨庭硕审订.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12

(历史人类学文献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21 - 09162 - 8

I. ① 苗… II. ① 罗… ② 张… III. ① 苗族 -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贵州省
IV. ① K892.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0958 号

《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

[清]严如煜著 罗康隆 张振兴编著 杨庭硕审订

责任编辑 / 沈晓枫 史开杰

封面设计 / 邹 刚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4)

印 制 /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75

字 数 / 35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09162 - 8 定 价 / 36.00 元

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代总序)

杨庭硕

这套丛书虽然以历史人类学命名,但读者将看到的绝不是枯燥无味的纯理论推导,或者仅是吹毛求疵的字词校释,而是几乎可以触摸的文化历史事实再现。在历史人类学看来,历史事件虽然永远不可能重复,但孕育历史事件的文化却从来不允许中断。历史事件不仅专属于古人,也影响着今人。因而,湮没在尘埃中的历史事件,今天的人照样可以真实而全面地认知和理解,也可以和古人一道分享。当然,要完成这样的研究使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严谨的学风、缜密的理论推导,更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避艰辛的执著追求。读者在这套丛书中将感受到的,正是我们多年默默无闻探索的成果。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遥远历史的生动再现。

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之母,又是我国学科体系的强项。但要使我国传统的历史学获得新生,肯定需要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学术理念。历史人类学正是从这一需要出发,力图做出自己的新贡献。历史人类学并不否定我国传统史学的功绩和贡献,而仅是希望使传统史学与时俱进,获得新生。历史人类学需要做的事,仅止于丰富和完善世人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以利史学的研究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史学需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规范。这是一个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的跃迁过程。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与史学截然不同。然而,文化人类学既然要研究规约人类社会的民族文化,文化就必然是历史积淀的总成。以至于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并不是天外飞来的外在社会规范,而是着生于具体民族历史过程中的社会规范积累。就这一点而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化从来就是有历史的文化,而绝不是聪明人一次性制定

的刻板条文。就实质而言,文化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注,几乎与文化人类学的诞生同步,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各不相同罢了。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进化论者理解的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渐进演化过程。需要声明的仅在于,他们理解的历史是整体的人类文化史,而不是具体民族的历史。将民族历史具体化,开创于鲍亚士时代。鲍亚士学派坚持的历史特殊论,使文化人类学向史学研究大大地靠近了一步。但鲍亚士并没有找到将各民族历史具体化的可靠办法。这不是因为他个人缺乏聪明才智,也不是文化人类学自身的缺陷和偏见,而是因为他研究的民族缺乏最基本的历史文献记载,使他无法做无米之炊。斯图尔德开创了文化生态学,力图从生态背景的差异和文化的适应两个角度,去揭示文化变迁的特殊历史过程;从而使各民族历史的特殊论在所处境况的基础上,向各民族的具体历史又前进了一步。但他同样遇到了研究对象文献史料记载匮乏的难题,以致他的后继者内亭尽管意识到了社会历史过程对文化形成的不可替代价值,但却仍然无法将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具体化。

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大不一样。中国传统的治学思想多的是历史感,少的是文化观。以致蔡元培和刘师培将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进化论从西方搬过来,去解读中国的远古文献,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等到人们的情绪冷静下来后,人们立刻发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并不服从统一的进化模型,而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具体历史,或者说仅属于本民族的特殊历史过程。于是围绕着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与中国史学研究的结合,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探索。杨成志将地方志资料引入了对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研究,力图改变西方人类学片面强调共时态文化实证而导致的浅薄,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但这毕竟还不是文化人类学与史学的结合,而仅仅是对文本史料的借用。戴裔煊则致力于文化圈形成过程的历史解答,他看到的仍然是文化演化的共性,而不是各民族文化演替过程的具体化。江应樑坚持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和考古学三结合的研究,并为此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但却未能提出三者结合的原则和规范,因而仍然只能视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奠基,而不是中国历史人类学本身。

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学科体系,高举实证主义的大旗,将能不

能直接验证作为界定学科性质的唯一依据。从而把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建构起来的一切学科划分为三大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依托于文本史料,而文本史料所提供的资料又无法直接加以验证,因而被排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归属于人文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致使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加以直接验证,成了这门学科的致命缺陷。这就使历史学的研究在西方陷入了困境。要为历史学争取到一个正宗的科学定位,就必须奠定它的直接验证基础。汤因比倡导的比较史学,其目的正在于力争将文本史料纳入可以直接验证的轨范,而这样的努力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在法国萌生了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是由法国的年鉴学派提出的。提出历史人类学的初衷,就是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使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在可验证的基础之上,为历史学的研究赢得科学的正宗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国的年鉴学派至今已有了三代的学术传统,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的幻术》(1942)、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1942)、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物质主义与资本主义》、埃马纽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这些研究传到欧美各国后,又产生了如下一些代表人物,如英国的E·P·汤普森、美国的克利福德·格尔兹和马歇尔·萨林斯等等。并在20世纪后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港、台和岭南的学者,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的跃迁,必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探索历程。要将文本史料纳入直接验证的轨范,始终存在着三大障碍。其一是,如何验证史料的真实性。其二是,跨时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三是,已经丢失的历史信息是否可以重新发掘出来。突破这三重障碍,当然得依托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然而文化人类学的立足点正在于强化共时态的研究,以便使研究的结论可以获得直接的验证。要将适用于共时态研究的理念转而应用于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空域,自然成了历史人类学学理建构的核心难题。年鉴学派的三代学人为此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三重障碍,使历史人类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

人类的历史肯定是一个不可复的过程,要获知历史上某一时空域内

的历史信息,就不得不借助于传世的文本史料。而传世文本史料提供的历史信息,又因为历史的不可复性而无法加以直接验证。因而,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人对传世文本史料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企图借助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去丰富和发现可以验证的历史信息。与此同时,还尽力地发掘和利用非官方的文本史料。由于这样的文本史料较少受到不同时代官方政治立场的干扰,因而可信度高于官方文本史料。在这一立论思想的指导下,否定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权威作用,而将日常的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经济史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就势在必行了。他们的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涵。这一研究传统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传人中也得到了遵循,他们的后继者们从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整体观出发,形成了一些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名著,如埃马纽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之岛》。前者以宗教裁判所传唤异端嫌疑犯的口供为依据,复原了14世纪法国西南部一个普通村庄的放牧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等历史面貌;后者则是以英国航海家在太平洋诸岛的航海日志为依据,还原了欧洲人在太平洋探险时代的时空域,并在这样的时空域内试图重现那个时代的族际关系过程。类似的研究由于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把流传下来的历史信息纳入历史特定时空域内作文化整体的分析,使不可重现的历史信息获得了间接的验证,从而使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获得了间接验证的可能。这样的研究思路对我国近年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官方文本史料的应用被推上了历史研究的前台。同时,研究者们也出人意料地发现,在这些非官方的史料中照样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国家权力影像。在官方史料文本浩如烟海的中国,获得这样的感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历史人类学第一代学人的某些偏见。任何形式的史料文本都会打上不同时代编修者的烙印,但却不会凭空建构历史,而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建构历史。史料文本通过间接的验证总可以证明其中既包含着可信的历史信息,也包含着编修者的理解和想象。对待不同类型的史料,只能信其可信,去其不可信,而不能单凭史料文本的类型定是非。

历史上的不同文化和社会生活与当代社会处于不同的时空域,因而其社会及文化的整体自然与当代社会截然不同。以致属于历史上特定时空域的社会生活及其文化,显然不能用当代的文化观去加以解读。于是,

即使确认了历史信息属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空域,要真正弄懂其社会及文化含义,绝对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加以解读,而必须借助那个时代的观念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文化人类学早就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但这一理论仅是提供了史料解读的原则,而不能代替具体的解读。于是,要将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应用于对历史事实的解读,就必须做出如下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要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框定明确的时空域;二是,要明确在选定的时空域内,到底共时并存着哪些历史信息。只有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和文化解释方法才能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作用,并使历史研究获得间接验证的可能。为了突破这一难点,布罗代尔将社会文化作了层次的划分。将人物和事件作为第一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变化速率最快,具有突发性,因而被他称作短时段的历史。第二个层次为社会文化,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等等,这一层次的历史其演化速率慢于人物、事件这一层次的内容,但又快于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的演化速率,因而被他称作中时段历史。他所谓的长时段历史,也即第三个层次的历史,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这一层次的历史演化速率最慢。在他看来,短时段的历史只是历史的表面层次,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十分有限;中时段的历史对历史进程则起到了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的历史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做出这一划分的理论依据是文化人类学泰勒时代提出的文化残留理论,其实质在于,揭示了文化要素的演进具有非等速性。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那些长时段的历史内容不仅可以获得间接的验证,甚至还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因而有进而获得直接验证的可能。

在他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第一部分描写的是地中海地区10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包括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等,力图说明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这部分内容,其实质就是他所宣称的长时段历史,也是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那部分历史,因此这部分历史也就获得了直接验证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加看重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

该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人口、劳动力、货币流通、物价等等。这些内容显然属于特定时空域的产

物,今天已经无法加以直接观察和验证。对此,他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所提出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力图把16世纪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去加以分析和研究。他的这项研究工作实质上是历史人类学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研究使命,即历史信息的解读。这项解读,必须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决不容许以今释古,只能用当时的立场和观点对社会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去做出说明。就这样,他的这一研究个案,圆满地解决了时空域界定和历史信息解读的难题。

该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史、军事史,主要描述土耳其与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地中海的过程。他认为这部分历史属于短时段历史,只是历史的表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限。即令是两大帝国争霸直接牵涉到的民族,战后改变的也仅仅是其归属,而实际的社会生活则并不发生质的变化。这一结论,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史学的习惯性看法,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之失去了在历史研究中的独尊地位,而普通人的实际社会生活却在历史研究中突现出来。

突破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有效结合难关的不仅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的前辈们也对史料信息的解读作了重要的铺垫。吕西安·费弗尔在《拉伯雷与16世纪的不信仰问题》一书中,事实上是重新解读了16世纪的欧洲宗教史。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在天主教处于至尊地位的时代,只能是一个极端封闭、极不科学、没有任何创造力的黑暗时代。但在该书中却注意到,传统的史学结论只是在以今释古,而没有触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费弗尔看来,宗教的权威仅是表象,在真实的社会中,不信神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社会的进取、个人的创新并没有真正被窒息,而是在为以后的资本主义勃兴作了社会文化的铺垫。费弗尔的这种解读,在布罗代尔的手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先于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各地已经普遍存在。至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化运作和规范,为何最先出现于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才是尼德兰革命,以及日后的英国,这仅仅是由机遇决定的偶然事件,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近年来,年鉴学派的这些工作对我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明珂的《羌在藏汉之间》一文,凭借对广泛流传于羌族中的兄弟定居传说的解

读,复原了这一传说在权力的拥有和资源分配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使一个看上去并无深意的民间传说获得了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解读,从而使中国无比丰富的传说、礼仪、习惯都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历史研究价值。

特定民族的历史其内容极其丰富,无论研究其间的哪一个时空域,官方文本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肯定极其有限。凭借有限的历史信息,显然不足以复原历史的全貌。因而,致力于发掘和利用新的历史信息,自然成了历史人类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从马克·布洛赫到埃马纽尔·勒华拉杜里,在否定官方文本史料权威性的同时,都致力于发掘来自社会下层的各种民间文本史料。但即令如此,他们仍然感到历史信息的贫乏。于是,又理所当然地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凭借社会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文本史料信息之外去发现新的历史信息,同时赋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解读。布罗代尔的绝笔之作《法国史》第一卷《法国的特性》就大量地运用了法国出土的考古资料。在他看来,法国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特性还一直影响到今天。在这里,他倡导的大尺度、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并因此为其他学科史料信息的发掘和利用奠定了学理依据。其中,通过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发掘新的历史信息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后继者中倡导口述史的解读,则是在他倡导的学理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地延伸。

中国的文本史料尽管浩繁而完备,但在贯彻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时,同样感到历史信息不足。发掘非官方的文本史料和非文本史料,在我国近年来的研究中依然能引发强烈的响应。刘志伟通过珠三角村寨空间布局,特别是宗祠空间布局的解读,成功地复原了这些集镇的形成过程,以及围绕其形成而相伴的经济、习俗、社会组织的变迁。这一研究堪称是不动土的考古发掘研究。赵世瑜则凭借早已被人淡忘的宗族记事碑刻,去发掘这些碑刻所处时代的历史信息,成功地复原了不同地区的历史社会生活面貌。这些研究都充分证明,整体的历史虽然不可复,但历史信息却是可以重新发现的,也是可以重新解读的。发现与解读信息,与新考古学的主张不谋而合,都是在发掘中借助于新的技术和方法,提取可靠的并经得起反复验证的历史信息。

今天,历史人类学在我国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上述三大难题的解决,加上我国有丰富的文本史料储备,历史人类学的长足发展,

在我国正当其时、正当其用。为此,我们将大力推出这套历史人类学研究丛书。我们希望将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下去,不仅要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解读官方文本史料,还要解读非官方的文本史料,甚至是口述史资料,而且还要致力于借助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发掘历史信息。要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定型一套中国式的历史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规范,使发端于法国的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真正实现本土化,成为中国式的历史人类学,让历史的研究成为能直接服务于当代社会的有用工具。由于工程的浩繁和我们的学养欠缺,我们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批评和斧正,更期望有志同仁积极参与,使这套丛书更具活力,能够为我国广大读者所认同。谨此为序!

2007年3月10日于吉首大学梓园村

序一

张新民

严如煜编纂《苗防备览》著有“风俗考”上下两卷,其中不仅记载了苗族的风俗,还牵连记载了土家族等相关其他民族的风俗。而编纂“风俗考”的目的不言自明,是为政府的防苗御苗而提供有关各民族风俗习尚的资料依据。从全书的结构来看,这样的目的和意图无可厚非。然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必然是为了本民族的生存需要建构起来的社会规范,绝不可能屈从于统治者的治理需要。这就意味着严如煜的编纂企图与各民族风俗习惯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此前的历史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原则上是立足于对文本典籍的信任去对待传承下来的文献资料,也就是说“风俗考”中所提到的内容,后人一般不会加以质疑。这样一来,编纂意图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就可能被掩盖起来。罗康隆等人的新作《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的面世则开辟了一条透过传世文本把握历史真实的新途径。经过考释,不仅使严如煜的原作更容易被当代的读者理解和把握,而且通过考释后原作中隐而不显的内容,在200年后的今天重新变得明白如话。严如煜当年为时局和决策所需而导致的误记乃至错讹,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订正和复原。严如煜当年没有意识到的很多关键问题,通过考释,今天的读者可以把握得比严如煜还要更加清楚。对典籍的考释要做到这一步,能够达到升华的境界,绝不能单凭勤奋,更不能凭借资料的堆积,而是得用巧力,得用新的思路和方法。研读原作,发掘原作中隐含的内容,还得赋予当代的理论与方法,去识别文本所载内容的真伪,把握记载的实质,这样的新方法就是本书作者所推崇的历史人类学方法。

历史人类学方法既然贯穿了本书,要全面认识和理解什么是历史人类学方法,读者可以自己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慢慢去领悟。但作为一个导读,提供如下三个例子,希望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是立足于跨文化事象综合分析的方法,对严如煜的资料收集和

整理工作作了很高的肯定和提升。《苗防备览》原文中出于防苗、驭苗的需要,极为翔实地记载了苗族所用的武器以及苗族的战略战术,进而还延伸到为何“土家人”和“仡佬人”,有足够的实力在战争中制服苗族而获胜。并据此提出建议清廷应当如何去应对苗族的武器和战略战术,以便凭借最小的投入和代价彻底控制住苗族。在严如煜的原文中仅仅是交代了事实和结论,至于结论是否正确,又该如何验证,这就不能苛求严如煜了。而本书作者则是延伸了自己有关《族际的关系论》的分析方法,明确指出武器和战略战术是文化的构成部分,在跨文化之间运用时必然会表现为得失参半。跨文化的应对良方莫过于对自己扬长避短,对对方则应当攻其短而抑其长。“土家人”以及“仡佬人”擅长于对付苗族的进攻,就是找准了苗族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的弱点。而严如煜洞见到苗族“苗人离窠不能逾百里;攻城不能过三日。”这样的弱点恰好是苗族执行游耕生计必然派生的文化事实。有了这样的跨文化分析手段,200多年前的结论,到了今天也就可以获得符合逻辑的解读和验证。

苗族的宗教特点,在严如煜看来是苗族社区容易发生动乱的原因之一,据此严如煜明确地主张政府应当控制苗族的信仰,特别是要控制椎牛的大规模消费,以避免苗族贫困化后的铤而走险。而本书作者则是凭借文化的整体观,旁征博引了20世纪以来的对各地苗族习俗调查的成果,不仅订正了严如煜的某些含混不清的记载,还对他的上述建议展开了文化分析和解读,从中发现苗族的宗教信仰中要消耗大量的资财是一种文化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在苗族文化中是可以承担和消化的。即令苗族为此而贫困,却不会成为反对朝廷的导引。严如煜这一建言的局限性才第一次获得了符合逻辑的披露。严如煜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将湘鄂渝黔边地区并存的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作了恰如其分的对比,目的是为朝廷提供施展“以夷制夷”依据。而本书的作者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对每个民族而言,都具有其内在的系统性和牵连性。以至于民族之间的差异会表现为稳定性很强,只要运用得法,仅仅是有限的文化差异实例就可以凭借文化的整体观做到展拓性的认识和把握,在把握并存的民族文化差异中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这当然是严如煜不可能想象到的内容。

总之,本书虽然是对《苗防备览·风俗考》的释读和考证,但由于本书的内容是站在现代学术水平的高度,去反观前代的文献,因而所揭示的

内容乃是原作的升华而不是翻版。

当然对原作中出于决策建言的需要而作出的误断,本书作者同样是借助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有下面两个。

严如煜在原作中曾反复强调,苗族社会中高利贷盘剥现象极其严重,并进而指出高利贷的泛滥乃是苗民骚乱的重要社会原因。但本书作者凭借民族文化的整体观,对上述结论提出了质疑。苗族各村寨之间连年“打冤家”,社区内并不存在跨家族、跨社区的行政权威,这是严如煜已有的结论。然而开展高利贷盘剥需要的恰好是跨社区的行政权威作为后盾,而这样的后盾在苗族社区肯定没有,如果有,在“打冤家”的过程中也会被抵消掉。真正能提供行政权威的不是苗族社会而恰好是清廷官府。正是凭借这样的对民族文化的整体把握,顺理成章地证明了严如煜的见地有利于清廷对事件责任的开脱,而没有反映苗区的实情,真正在苗区放高利贷的只能是那些得到官府暗中保护的汉族“流民”。苗民起义中提到的口号“逐客民,复故土”,要逐的恰好是这样的非法“流民”,而不是清廷的行政存在。《苗防备览》原作中援引了苗族首领的供词为证,一再声称这些“反叛”的苗族首领都是家有大量稻米囤积,财力充裕,足以收买苗民反清的大财主。可是本书的作者同样借助于朝廷决策的整体观,清醒地指出严如煜的原文中前后文所记载的内容自相矛盾。在苗族地区水田极少,苗民都是靠杂粮为生。各社区之间又相互“打冤家”,雇工租佃都难以跨家族实施,这一点清廷早已知道。清康熙年间并没有在苗区按内地惯例收税就是明证。与此同时清廷也掌握了翔实的资料,知道汉族地区富余的人口已经形成了“流民”群,而且已经窜入苗区。当然作为一个政权,一旦苗民起义爆发,绝对不可能承认自己控制“流民”无方,而只能归咎于苗民的天性叛服无常。也正是因为把握了清廷决策的整体观,本书作者也就找到了严如煜的上述言论自相矛盾的根源。只有这样去上报苗民首领的供词,才既能符合清廷决策的宣传需要,又能对此前的地方官的失察开脱罪责,还能够对清廷的镇压和征讨行动提供口实。决策需要与叙事的历史真实之间,如何相互衔接和兼容,又在同一本文献中表现出来,就此获得了符合逻辑的说明。当然,没有历史人类学的眼光,文献原文的自相矛盾也就无法被揭穿。就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虽然过去了200年,而且有原作为我们提供200年前的社会信息,但本书的问世在思想境界和对事实的把握上显然有甚于原作。这正是本书值得阅读的理由。

序二

李汉林

《苗防备览》一书自成书以来一直深受学术界的青睐与好评,其后,湘、鄂、渝、黔四省所续修的各府、州、厅、县志往往取材于《苗防备览》,并对相关的内容做了增补,但对《苗防备览》原书则缺乏系统的研究。学者们热衷于将《苗防备览》作为史料库藏去利用,但对《苗防备览》所贯穿的治苗思想,以及作者严如煜本人的学术经历则探讨不够。罗康隆博士和张振兴联合推出的《〈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一书却能另辟蹊径,针对我国学术界之所缺,将《苗防备览》文本作为第一性的研究对象去加以探讨,以便再现乾嘉时代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实情,以及清廷相关政策的得失利弊,能够让今天的读者和后人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主流思想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和把握。这是学术界的一大幸事,因而隆重推介。

目前问世的这部著作,虽说仅是对《苗防备览·风俗考》所展开的研究,但研究的方法和达到的深度却富于创意。其中,最值得称道之处不下于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高度关注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立足于苗族文化的整体性和清廷治边决策的整体性去发掘,展示《苗防备览》原书所荷载的文化信息,因而得出了有别于此前结论的新认识。在书中,作者较为可信地指出乾嘉苗民起义的起因关键是无业汉族流民向苗区的渗透,以及这些流民的非法行为损害了苗族的利益,因而起义的爆发具有不可避免性。然而,清廷出于决策统一的需要,在事发后又不得不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使相关的苗族居民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与此同时,清廷对善后事宜的处置又不得不做大幅度的让步,将久已废弃的边墙重新修建,以便应对无业流民的再次生事。这种能够将区域性的历史与全国性的形势有机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推崇与仿效。

其二,立足于苗族风俗的探讨,两位作者在思想方法和关注点上做了极大的调整,不像此前的研究者那样,仅片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疏于关

照人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在《苗防备览·风俗考》原文的字里行间,勾稽和破译出前人所不注意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信息来,使这本为防苗和备苗而写作的决策性著作成了生态史研究的可信资料来源,能够为相关地区的生态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

其二,在这本新作中始终贯彻了民族学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从而在这本新作中,能够较为彻底地破解对苗族文化的诸多偏见。自明廷着力经营湘西苗疆以来,外地对当地的苗族文化就充满了偏见,习惯性地将这儿的苗族理解为强悍、不通情理、乌合之众。然而,这本新作的问世,由于书中对严如煜的原作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并据此揭示了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众多差异,进而说明在文化冲突过程中,双方都各有利弊得失,以至于决策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做到知己知彼,而严如煜的某些见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充满了睿智。

历史人类学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吉首大学近年来民族学学科科学研究的亮点之一。该项工作之所以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其关键在于他们对历史人类学有一系列独特的认识和理解。以本书的出版为例,两位作者事实上是将严如煜的原作,作为民族学田野调查的蓝本去展开再认识和再研究。其目的不仅在于要恢复和深化原作者的本意,更关键的还在于将特定的时空场域,也就是乾嘉时代的湘西苗区作学理探究的回归对象去对待。尽管时代在向前发展,今天的湘西苗区与乾嘉时代的苗区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苗族文化的变迁,乾嘉时代苗族文化的真相已经成了需要加以考订和复原的历史对象。这本新作的作者能够忠实于严如煜的原作,并借助原作提供的资料应用民族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真正做到了贯通了古今,重现历史。因而,不管是出于研究的目的,还是出于认识和了解苗族文化的目的,或者是从中找到民族政策的决策和参考,这本新作都值得一读。

谨此为序,并祝贺两位作者的成功。

2011年5月